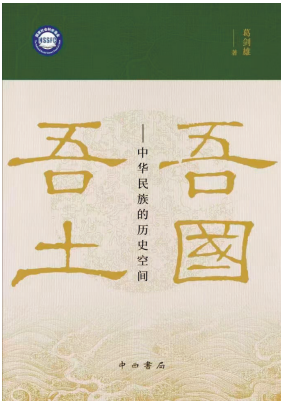




空间维度的历史叙事

刘金祥



《吾国吾土——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葛剑雄著，中西书局2026年1月出版。

在传统历史著作写作经验中，以时间为序无疑是一条主线和脉络——王朝更替如“城头变幻大王旗”般流转，年代尺上的标记构筑起人们对过去的全部想象。然而，当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推出新作《吾国吾土——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以下简称《吾国吾土》）一书时，他选择了一条迥异奇诡的学术进路：将“空间”作为书写和理解中国历史的钥匙。中国悠长厚重的历史从何而起？中华博大精深文明如何生根发芽、经久不衰？《吾国吾土》一书辑录了葛剑雄教授近年公开发表的数十篇新作，以其深厚史学积淀与独到现实洞察，从承载文明曙光的甲骨、青铜，到孕育无数灿烂文化的黄河、长江，再到影响区域与世界交流的运河与丝绸之路，将中华文明的源起与发展娓娓道来，为读者打开了一个理解“何以中国”的全新维度。

民国以降，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发轫，至上世纪80年代已渐趋成熟。特别是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编的、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巨著《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一系列新著出版后，我国历史地理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和重视。但限于全国高校鲜有设置该学科的本科专业，加之开设中国历史地理本科课程的大学也寥寥无几，因而多年来几乎没有一本普及性的历史地理读物，中国历史地理的基本事实和重要的研究结论长期不为学界和公众所知，历史地理的基本常识得不到广泛及时的普及。这是一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旨在以地理视角重述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故事。《吾国吾土》一书以“地理空间”为方法论，通过爬梳中国古代行政区划、人口流动迁徙、城市生成演变等历史地理脉络，深刻阐释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深远影响，揭示中华民族如何在多元地理格局中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葛剑雄教授在书中开宗明义阐述历史地理学的核心命题：“‘当下的这个地方’、‘我’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往往都离不开我们的先民所处的地理环境。”这句话看似直白朴素，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学术洞见——地理不是历史的被动容器，而是历史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早在民

国时期，葛剑雄的授业恩师谭其骧与顾颉刚两位史学大师在创办《禹贡》半月刊时，就曾留下“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的经典论断。然而葛剑雄教授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基础上，又将这一认知向前推进了一步：“地理不仅是舞台，它本身也是演剧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是历史戏剧上演的场所，环境，更深刻地参与到历史进程本身。”这一精辟判断构成了《吾国吾土》一书的方法论基石。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镜，葛剑雄教授从地理环境中寻找解释框架。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北临西伯利亚，东濒太平洋，南有热带丛林，西有青藏高原——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为中华文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天然屏障。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兵锋直抵印度，却被高耸的帕米尔高原挡在中国门外。与此同时，中国物产丰富，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又降低了对外的依赖，从而保证了文明的内部延续性。这不是地理决定论，而是对地理条件与文明走向之间复杂关系的清醒认知。

《吾国吾土》一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对“中国”概念进行了历史主义的梳理。葛剑雄教授指出：“经过3000多年的历史，‘中国’已经从一个小小的居民点、一个城市的概念，扩展到了覆盖9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一个伟大国家的名称。”这一演变过程并非简单的空间扩张，而是伴随着政权性质、文化认同与国家形态的深刻转变。书中对中国历代疆域变迁的讨论，始终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什么是“中国”？葛剑雄教授的回答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具有清醒的现实关怀。他指出，历代王朝的疆域边界并不等同于今天中国的版图，不同时期的“中国”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既避免了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也为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扎实的学理支撑。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葛剑雄教授在思考疆域问题时，并未囿于单纯的边界测绘，而是将其与行政制度、治理成本、地理条件联系起来。书中分析了从郡县制到州郡制，再到隋唐道州县制、元朝行省制的演变，揭示出制度变迁如何回应不同地理条件下的治理需求。山区的分散治理、平原的集中管控、边疆的特殊设置，这些都不是随意之举，而是地理环境与政治智慧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疆域是历史的“横断面”，那么人口迁徙就是贯穿其中的“纵贯线”。《吾国吾土》一书以大篇幅讨论了移民史与民族融合的问题，这也是葛剑雄教授数十年学术积累的自然延伸。葛剑雄教授在以往的研究中早已阐明：“人是文化最丰富、最活跃的载体，一定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导致原有文化的转移。”在《吾国吾土》一书中，这一判断得到了更加生动、具体的呈现。从秦汉时期的北民南迁，到永嘉之乱后的衣冠南渡，再到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每一次大规模人口移动都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更，更是文化基因的重组与更新。

在民族融合问题上，葛剑雄教授强调了一个关键的文化机制，“华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只要外来者接受我们的文化，那么，无论外来者原来是哪里的人，属哪个民族，是什么血统，我们都会承认外来者、异族已经‘由夷入夏’，不再是‘非我族类’，而是自己人。”这段话揭示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核心逻辑——文化认同先于血统认同。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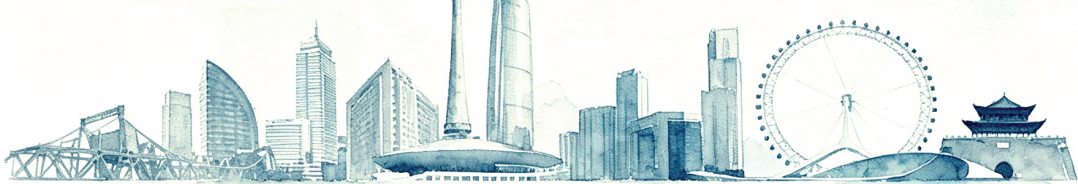


从“天津之问”到“天津之行”

——一场奔赴未来的再出发

激烈的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进入新阶段，赋予了天津“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为老工业城市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可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升级，对城市的功能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旧变革、继往开来之际，天津停下脚步，回望来路，积蓄力量，踏上一场从“天子渡口”到“天下之津”的转型，则构成了回应“天津之问”的“天津之行”。

“天津之行”的题中之意，无疑是“再出发”，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再出发”意味着发展理念的重塑。告别粗放型增长的路径依赖，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重新校准航向。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第一动力？如何让绿色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底色？如何让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市民？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天津未来发展的高度。“再出发”意味着城市功能的再造。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如何在新格局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作为现代制造业重镇，如何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中占据主动？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如何在制度型开放中闯出新路？功能的升级是城市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吾国吾土》一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体现在其写作策略与传播功能上。该书被定位为“入门级学术读物”和“大家写小书”的实践范例，其目标定位不仅是专业学者，更是众多对历史感兴趣的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葛剑雄教授在以往的访谈中曾明确表达过他的普及理念：“历史学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普及研究成果。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我们取得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公众往往还停留在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上。但是你不能怪公众，你不能说我出了重要的专著，任务就完成了。”这段话道出了学术研究 with 公共知识之间的现实落差，也彰显了葛剑雄教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吾国吾土》一书在普及策略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既不降格以求、牺牲学术严谨性，又不故作高深、拒人于千里之外。书中配有大量高清摄影与历史地图——秦长城遗址的苍凉、何尊等文物的精致、《东汉刺史部图》与清代《全漕运道图》的周细——这些图像资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更实现了“图像证史”的功能，让抽象的历史地理理论变得可感可触。读者评论中频繁出现的“好读”“没有晦涩术语”“娓娓道来”等评价，印证了该书在可读性方面的成功。有评论者写道：“本来以为很生涩，意外很好读，三天就读完还做了简单笔记。”这种阅读体验的反馈，恰恰说明葛剑雄教授在“大家写小书”这一目标上的切实达成。

通读《吾国吾土》一书，可以感受到一条贯穿始终的精神脉络：通过对历史空间的考察，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从而为今天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信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该书陷入了简单的颂歌式叙事。相反，葛剑雄教授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冷静与审慎。他在谈及历史研究的态度时曾强调：“历史研究就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并且用正确的历史观来加以解释和引导。”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贯穿于《吾国吾土》全书。书中不回避历史上疆域的伸缩、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环境的变迁与破坏，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寻找规律、提炼智慧。葛剑雄教授对当前历史普及中的某些倾向保持着清醒的警惕。他尖锐地指出：“影视作品传播的历史是观念，而非真正的历史。比如雍正皇帝，真正的雍正既不是民间传说的那样，也不是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在他看来，将历史简化为帝王脸谱和宫斗桥段，只会让观众获得廉价的情绪，而非真正的历史智慧。《吾国吾土》一书正是对这种倾向的“拨乱反正”——它不靠渲染宫斗传奇吸引眼球，而是靠扎实的学理和清晰的视角，引导读者建立自己的历史认知坐标系。

《吾国吾土——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中国历史地理的核心内容，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思维方式。当时间维度的叙事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绵延五千年不断”时，空间维度给出了更明确的答案：是山川的屏障、河流的滋养、气候的馈赠，加上一代代人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创造与文化积累，共同铸就了这个伟大文明的生命力。葛剑雄教授曾说：“我对历史地理的追求永远会有新的目标，80岁是新起点。”对于读者而言，《吾国吾土》一书或许正是一个起点——从这里出发，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与过往历史之间的深刻关联，以更立体的视角理解“何以中国”这一永恒命题。在这部博约兼顾的学术小品中，空间的历史与时间的历史终于握手言和，共同讲述着中华文明的不朽故事。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融通城山文脉 重构津门史境

洪 猛

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是连接历史与现实、宏观文明与微观区域、学术探索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探索面临视野狭隘、学科割裂、范式陈旧、理论薄弱等多重瓶颈。在此背景下读到白俊峰的《城市、山林与艺术：天津历史文化四题》，白俊峰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

该书收录作者持续打磨的四篇长文，分别是《认识天津历史文化的三个维度：兼及方法论问题》《身份焦虑与文化认同：对〈秋庄夜雨读书图〉的再观察》《塑造山林：盘山历史文化述要》《记忆的建构、改造与误读：北少林寺史实辨正》，主题分别对应空间结构、艺术个案、山林体系、历史记忆，由宏观铺陈到微观细读，由城市核心到周边山林，由史实考证到理论升华，紧扣天津历史文化的“面、线、块、点”，各板块形成层层递进、闭环自洽的逻辑体系，展示了独特的立体阐释格局。

首篇承担总领全书、搭建框架的核心作用，是整部著作的理论基石与格局支撑，针对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存在的“建城史窄化叙事”与“中心城区单一叙事”误区，提炼出天津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多元性特征，搭建起地域历史文化研究通用分析工具——“全国—全域—全时”三维认知体系。这不仅重新解构了天津历史文化的传统叙事模式，更为后三篇专题讨论提供了统一分析视角与评判标准，奠定了全书“全域性、长时段、跨学科”的研究底色。

第二篇属于城市艺术史微观个案研究，以天津博物馆藏清代朱岷《秋庄夜雨读书图》为核心史料，实践图像证史研究路径，同时高度重视作为图像“副文本”的题跋，在图文互读中切入清代天津高雅文化从创造到确认，再到追溯的完整线索。该篇把视觉材料和题跋文本作为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并从中提炼出带有显著模式化特征的城市高雅文化发展脉络，精微揭示出地域内历史文化传统生成演变的轨迹，提供了一个“小图像、大地域”的新鲜视角。该篇无论是材料使用还是观点提炼，都较之作者此前的专著《故人在江湖：查礼与清代天津盐商艺术生活研究》有所提升，是对同一题材持续深耕的结果。

第三篇承接首篇“全域维度”理论，专门解决传统研究中“城山割裂”的问题，通过系统梳理蓟州盘山完整人文发展史，构建“城市平原—山林腹地”一体的天津地域历史文化体系。作者跳出传统山志罗列景点的写法，着意于人文历史、遗产形态、文化空间、文化生态等叙事，创新性提出了实体遗产、文本遗产两个概念，整体建构了观察盘山的方法体系，弥补了天津山林文化系统性研究的薄弱，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和实验性，以实例推进了中国地域文化空间理论体系建构，也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第四篇将史料考证与理论思辨相结合，完成了对北少林寺历史误读的正本清源与理论升华。该篇通过梳理碑刻文献、考古资料、山志记载等，厘清了盘山北少林寺“法兴寺—栖云观—法兴寺—北少林寺”的历史演变脉络。但是，作者并不止于史实辨伪，而是深入探讨“历史误读的生成机制”，这种对记忆、书写、认知的深层反思，相较于一般性的考证文字，不仅体现出作者善于从一般材料中挖掘新角度的能力，而且为读者了解“客观历史真实”与“层累建构的历史文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供了一个优秀案例，从而使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摆脱了“史实考据”的单一维度，跃升到历史哲学层面的思辨。

细读品读该书收录的文章，越发感到不仅新见迭出，更在于其宽阔视野与路径创新，全域视野、跨界方法、问题导向、理论升华四大维度环环相扣、相互支撑，进而实现了整体性的学术突破。

全域视野突破，集中体现为打破空间、时间与城乡三重边界，重塑天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版图。空间上以文化关联性替代行政边界，构建起“城—河—山”一体化文化版图，将天津置于多重文明交汇格局下系统考察，跳出地方本位，实现区域与全国视野的双向贯通。时间上以考古长时段消解“六百年建城史”的窄化叙事，打通古今文脉，建立起十万年人类活动至近代中西交融的完整连续时段，通过长时段考察提炼出天津“多元交融”的底层文化基因。城乡方面，本书揭示了城市高雅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同为为盘山历史文化进行整体“画像”，二者互为补充与塑造，同构天津文化气质，实现全域一体解读。

跨界方法是该书的鲜明特色。该书摒弃了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基本依陈方志、传统文献资料的研究模式，融合文献史学、考古学、艺术史、文化地理学、记忆史学、宗教史等多学科工具，形成了可复制的跨界研究路径，充分反映出作者的知识跨界能力。史料运用方面，图像从辅助配图升级为核心史料。理论方面，不仅将多种学科贯通，尤其尝试文化地理、记忆史学、精神分析、权力叙事等方法，不断激发地方史料的时代价值。证据体系上，本书注重形成多重证据交叉校验，对北少林寺始建年代的考证敢于推翻作者早前的立论。研究尺度方面，“面、线、块、点”多层次研究结构，兼顾宏观、中观与微观，实现大尺度宏观阐释与小尺度精细考据的微妙平衡。

全书所有章节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起点，不做无的放矢的史料堆砌，每一篇都对应一类关键问题，并能够形成完整的问题回应链条。针对“重城区、轻郊野”的问题，第一篇提出全域、全国空间视角，第三篇以盘山为实例，论证城山共生的内在逻辑，弥合地域文化版图的人为割裂。针对“厚晚近、薄远古”的叙事缺陷，第一篇依托考古资料拉长时间轴线，提出重构天津历史文化的命题。针对传统艺术史研究“重图像、轻文本”的问题，第二篇从“副文本”的题跋出发，观察盐商的身份焦虑与后世的文化认同。针对地方史研究“重考据、轻反思”的问题，第四篇搭建“史实辨伪+记忆谱系批判”的考据架构。整体而言，全书所有考证、理论、方法均服务于破解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固有困境，问题意识贯穿其中，形成“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闭环。

缺乏理论指向的历史文化研究是没有张力的。本书旨在产出多层次理论思考，较突出者可举四例。一是建立“全国—全域—全时”三维认知体系，这一框架并非仅适用于天津，而是一套面向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分析标尺，具备跨区域推广价值。二是通过对艺术品产出和接受的反思，提出城市高雅文化发展“创造—认同—追忆”的分析模式，亦适用于天津之外的地区。三是提供了观察传统山林的文化空间分析模型，阐释山林人文塑造的内在规律，为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个解读案例。四是提出误读是层累叠加的记忆链条，在单纯的考据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步。书中对天津历史文化特质的提炼，也具有启示意义。

总之，《城市、山林与艺术：天津历史文化四题》最核心的学术贡献，不在于梳理了多少地方新史料，纠正了几处史实谬误，而是从个案出发，系统性回应长期困扰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结构性质缺陷，依据具体案例搭建起一套兼顾空间、时间、史料、理论、方法、反思的较为完整的研究架构。这也是作者推动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转向、文化转向、语言转向”的初衷。当然，作为一本体量不算大的著述，本书难免有遗憾之处，比如对天津极具辨识度的近代文化几乎没有涉及，地域上也不以蓟州与中心城区为主，在实践“全国—全域—全时”三维认知体系时尚显不足。冀望作者在此基础上，未来能有更全面、更系统的梳理，以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